

宋元谱录丛编 顾宏义 主编

洛阳牡丹记

外十三种

「宋」欧阳修等著

王云 整理校点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宋元谱录丛编 顾宏义 主编

洛阳牡丹记

外十三种

〔宋〕欧阳修等著

王云整理校点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阳牡丹记：外十三种 / (宋)欧阳修等著；王云整理校点.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 2

(宋元谱录丛编 / 顾宏义主编)

ISBN 978 - 7 - 5458 - 1348 - 7

I. ①洛… II. ①欧… ②王… III. ①牡丹—研究—洛阳—古代
IV. ①S685. 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08017 号

责任编辑 顾 佳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洛阳牡丹记(外十三种)

[宋]欧阳修 等 著

王云 整理校点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mm 1/32

印 张 7.125

字 数 160,000

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1348 - 7/S · 1

定 价 25.00 元

总序

何谓谱录？谱录就是依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撰成的书籍。^①《释名》释“谱”云：“布也，布列其事也。”又云：“谱，绪也，主叙人世类相继，如统绪也。”《说文》云“谱，籍录也”。而录即指按门别类、依一定次序记载相关人之言行或事物的书籍。因此，中国古代最先出现的谱录，乃与家族世系的记载密切相关，如司马迁《史记·三代世表》称“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西汉秘府藏书，有《帝王诸侯世谱》、《古来帝王年谱》等。因为此类谱录著作的编纂特点，故后人也开始利用谱录来记载不同类别的事物，如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即通过排比《诗经》十五国风、大小雅、三颂的资料而撰成《诗谱》，用以显示其与时代政治、地域风土间的关系。于是后来就出现了单为记载经典所载物品的谱录，如三国吴陆玑撰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进而有晋代戴凯之的《竹谱》，南朝梁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陈虞荔的《鼎录》等。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至此形成了一类以记物为主的书籍，专门记载某物或某一类物品的产地、形态、类别、特性、逸闻趣事及与之相关的诗文等，间附精美插图。至唐代

^① 朱积孝：《谱录述略》，载《图书馆》1995年第6期。

陆羽撰成《茶经》三卷，“其书分十类，曰一之源、二之具、三之造、四之器、五之煮、六之饮、七之事、八之出、九之略、十之图。其曰具者，皆采制之用；其曰器者，皆煎饮之用。故二者异部。其曰图者，乃谓统上九类，写以绢素张之，非别有图。其类十，其文实九也。言茶者莫精于羽，其文亦朴雅有古意。七之事所引多古书，如司马相如《凡将篇》一条三十八字，为他书所无，亦旁资考辨之一端矣”。^① 由此，此类饶有趣味的图书——谱录的体裁趋于成熟定型，而影响后世甚巨。

中国古代谱录发展至宋代，各种不同类型的谱录著述纷至沓来，卷帙繁复，蔚为大观：与农事有关的如曾安止的《禾谱》、僧赞宁的《笋谱》、范成大的《桂海果志》等，与日常饮食有关的如苏轼的《东坡酒经》、窦苹的《酒谱》、王灼的《糖霜谱》等与蔡襄的《茶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等，另有草木花卉谱如赵时庚的《金漳兰谱》、范成大的《范村菊谱》、胡元质的《牡丹谱》、陈思的《海棠谱》等，有鱼虫禽兽谱如傅肱的《蟹谱》、贾似道的《秋虫谱》、范成大的《桂海禽志》等，有文房四宝谱如苏易简的《文房四谱》、欧阳修的《砚谱》、李孝美的《墨谱法式》等，有玉石古玩谱如杜绾的《云林石谱》等，有泉币鼎彝谱如董道《钱谱》、洪遵的《泉志》、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的《宣和博古图》等等。这一文化盛观的出现，与宋代文化尤其是与市民休闲娱乐文化的高度繁荣密切

① 永瑤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茶经》，中华书局影印本。

相关。

我国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在《宋代之金石学》一文中指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其原因在唐、宋之际，随着阶级结构与生产关系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社会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人对日常娱乐休闲生活的需求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促进了城市娱乐休闲文化的多元化、平民化，使得娱乐休闲文化自贵族阶层整体下移至平民社会，从而构成了宋代文化大异于前代汉、唐文化的一大显著特征。在这一社会文化背景下，宋人撰写了多种专门记录与城市休闲娱乐生活紧密相关的谱录类书籍。与前代谱录多与生产种植内容有关者不同，北宋时人撰写了数量颇众的园林花卉、文人清赏类谱录，前者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沈立《海棠记》等，而杜绾《云林石谱》、苏易简《文房四谱》等显然属于后者。发展至南宋，更出现了与市井娱乐文化密切相关的谱录，其中著名者似当属题名贾似道所撰的《秋虫谱》（也称《促织经》）了。

宋代斗蟋蟀之风甚盛行，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载，南宋杭州人极喜养斗蟋蟀，所谓“促织盛出，都民好养”，街坊中辟有专门的蟋蟀市场，供爱好者选购：“每日早晨，多于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人火斗者。”而且由于玩者众多，所以城外农村里有专门捕捉、贩卖蟋蟀为生者，而城里也出现了专以驯养蟋蟀为职业的“闲汉”。贾似道为南宋末宰相，但也是一个著名的蟋蟀迷。据《宋史》载，当时蒙古铁骑大举围攻长江中游重

镇襄阳城，军情危急，但贾似道“日坐葛岭，起楼台亭榭”，与“博徒日至纵博”，甚至“与群妾踞地斗蟋蟀”，由此被后人戏称之为“蟋蟀宰相”。但他所撰的《秋虫谱》，分赋、形、色、养、斗、病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论述，可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影响后世颇大。

撰成于南宋中晚期的《百宝总珍集》，也可算是一本奇书。《百宝总珍集》，据清代四库馆臣推测，大概为南宋都城临安城中从事古玩珍宝生意的商贾所編集，但其撰者已不可考。书中所载所记百数种珍宝玩器，每每详列其市场价格、真伪优劣、辨识手段等，并于每种器物前具载七言绝句一首，而行文多用市井口语、鉴宝行话，如卷一“青玉”条诗曰：“青玉从来分数等，滋媚润者彼人观。做造不论大与小，碾造仁相做钱看。”文云：“凡看玉亦有数等，上至不断青，下至碧绿色者，若颜色唧伶，样制、碾造、花样仁相，盏碗或腰条皮、束带、绦环零碎事件之属多着主。如绿色或夹石样范，花样不好，皆是猫货。已上数等皆是卖外路官员，此间少着主。”可见具有很高的古玩鉴定价值，也可由此一窥当时与古玩相关的各色人等以及市井口语、风俗等等。

承宋代余绪，元人所撰谱录虽然数量较少，但与宋代相比，其内容多关于器物及食谱，由此构成了元代谱录著述的一个特色。

随着谱录著述之种类、数量都较前激增，于是在宋代书目中开始设置谱录专类以收录此类文献。

宋代以前，谱录文献被附入别类之中，如《隋书·经籍志》将《竹谱》、《钱图》等归入“史部·谱系”类中，《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却将《钱谱》、《相鹤经》、《鹰经》、《相马经》、《相贝经》等归入“子部·农家”类。直至南宋中期以前，仍无专类可归，如北宋《崇文总目》将《竹谱》、《笋谱》、《茶谱》、《花木录》、《钱谱》等归入“子部·小说”类，《相鹤经》、《鹰经》等归入“子部·艺术”类；而郑樵《通志·艺文略》将谱录收入“食货”类，其“食货”类下分六小类，其中《钱谱》、《鼎录》、《刀剑录》、《锦谱》等归于“货宝”小类，《墨谱》、《砚录》、《文房四谱》与《香谱》等归于“器用”小类，《相鹤经》、《相马经》、《鹰经》、《禽经》等归于“豢养”小类，《竹谱》、《笋谱》、《荔枝谱》、《花谱》、《木谱》等归于“种艺”小类，而《茶谱》、《酒录》等则分别归于“茶”、“酒”两小类。南宋著名目录学家尤袤有鉴于此，遂在其所编撰的《遂初堂书目》“子部”之下专门设立了用来收录上述相关书籍的“谱录类”。

对于尤袤在四部分类中设置“谱录类”的原因，清代馆臣如此分析道：“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附赘悬疣，往往牵强。《隋志》‘谱系’本陈族姓，而末载《竹谱》、《钱谱》、《钱图》，《唐志》‘农家’本言种植，而杂列《钱谱》、《相鹤经》、《相马经》、《鸞击录》、《相贝经》，《文献通考》亦以《香谱》入‘农家’，是皆明知其不安，而限于无

类可归，又复穷而不变，故支离颠舛，遂至于斯。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所以在其编撰《四库全书总目》时，即沿用《遂初堂书目》“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①但因属初创，故而《遂初堂书目》“谱录类”所收录的尚还混录有《侍儿小名录》、《警年录》之类当归入“传记类”的书籍，而至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子部·谱录类”则专门收载记物之谱录，并据图书的内容，还于其下分为“器物之属”、“食谱之属”与“草木鸟兽虫鱼之属”三小类。由此，谱录当以记物为主的定义方才正式定型。

因岁月久远，宋元时期的卷帙繁盛的谱录著述多有佚失，其具体数量今日已难以考述。今日可考录的宋元谱录，大致在120种上下，其中宋代谱录约100种。这流传于世的百余种宋元谱录，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其书完整保存至今的，如宋吕大临《考古图》、洪遵《泉志》、熊蕃《宣和北苑贡茶录》、元李衍《竹谱》等。二是其书通过《说郛》等丛书摘要载录才得以传诸后世的，如宋常懋《宣和石谱》、田锡《曲本草》、元宋伯仁《酒小史》等，已非完篇。三是从一书中抄录一篇别出而为单行本者，如宋初陶穀《清异录》本属杂采隋唐至五代典故的笔记著作，其中“茗荈门”被后人抄出单独成书，题名《荈茗录》，成为一本屡为后世引用的茶书。南宋著名文学家范成大撰有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五《子部·谱录类序》。

《桂海虞衡志》，有志山、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诸篇，被后人分别抄出单行题《桂海酒志》、《桂海果志》、《桂海花志》、《桂海草木志》、《桂海虫鱼志》、《桂海禽志》、《桂海兽志》、《桂海香志》、《桂海器志》等；而元代费著的《笺纸谱》、《器物谱》、《蜀锦谱》、《钱币谱》、《楮币谱》等，也本为其所著的方志《成都志》中诸篇，但为时人所珍视，而抄录别行者。对此，本丛编皆视为单独著述，分别编录于各类之中。

从现存的宋元谱录情况看，其著者遍及社会各层面，其中姓名可考的，有贵为天子者（宋徽宗《大观茶论》），有官拜宰执大臣的（如苏易简、丁谓、欧阳修、周必大、贾似道等），有著名文人、书画家（如宋苏轼、米芾、洪迈、范成大、陆游，元倪瓒、杨维桢等），有隐士逸人（如林洪等），有僧侣（如释仲仁、僧赞宁等），另外有署名别号的，如题名审安老人者撰有《茶具图赞》、渔阳公撰《渔阳石谱》、鹿亭翁撰《兰》等，或是因为此类谱录乃属“小道”，为免世人“玩物丧志”之讥而不愿题真实姓名者。但也有个别谱录的著者姓名原本失传不详，今所题姓名乃是后人在刻印书籍时所添加，其真伪于今日已不易探究，故本丛编一仍其旧。

本丛编所收录宋元诸谱录，大体先据其内容归入其类，同类者大体依据著者生卒年月为序编列（生卒年不详者，即以其主要活动年月为据编排）。每种谱录正文前，皆简述其撰者生平、谱录撰成年月及其主要内容、传世版本等情况；其篇末，

酌收有关序跋、题记等，以助于阅读。

本丛编所收录诸谱录，其底本一般择其精善且常见者，并酌校他本一、二种，但如其文字语义可两通者，即不予校改，而有明显舛误、脱漏、衍文者，则以圆括号“（ ）”标示其为误字、衍文，而以方括号“[]”标示其为正字、补字，但不另出校勘记。

又本丛编在编纂中，参考了不少前贤时哲的研究或校点整理成果，限于体例，未能一一标示指出，故于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顾宏义

乙未五月于海上梦湖书屋

前言

观赏类植物谱录的创作兴起于唐，盛行于宋。以其中占多数的花卉谱录著作为例，现在已知有记载的唐、宋两代作品约在 35 种左右，出于宋代的便已占 30 余种。宋代观赏类植物谱录，从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专记某一种植物，如欧阳修《洛阳牡丹记》、陈思《海棠谱》、王观《扬州芍药谱》等。由于所记对象常是作者钟爱的植物，且对象单一，故可以通篇之力描述这类植物的品种、源流、地方风俗，甚或历代与之相关的故实和诗赋。谱录中以这一类作品居多。另一类则兼记各类花木，如周师厚《洛阳花木记》、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中的《花志》、《草木志》等。这类作品如一一叙述各种植物来源、典故，往往成长篇巨制，如陈沂所集类书《全芳备祖》，不易完成，故大多记载简单该要。也正是得益于宋人谱录的大量存世，我们才可以更为立体详细地了解宋人生活中种花、赏花的方方面面。

一

春花之中以牡丹、芍药、海棠品种最繁，尤为时人喜爱。海棠花期在每年的农历二、三月份，先于牡丹。其时花木柔条新发，春意正浓，娇艳妖娆、红媚多姿的海棠，恰能触发赏花

人的感兴，许多诗人也把春来的喜悦和春去的忧愁寓于吟咏海棠之中。苏轼曾作《海棠诗》言：“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高烛照红妆。”道出了对海棠的惜爱之情。一夜风雨海棠花落，李清照“应是绿肥红瘦”的雅叹，也正写出了春光易逝的惆怅。

宋代海棠以蜀地最为有名，品种也最多。北宋沈立所著《海棠记》中言：“蜀花称美者，有海棠焉。然记牒多所不录，盖恐近代有之。”又记载唐相贾耽《百花谱》中“以海棠为花中神仙”。由此可知直到唐代，海棠还没有成为普及的观赏花卉。《海棠记》中又言：“海棠虽盛称于蜀，而蜀人不甚重，今京师、江淮尤竞植之，每一本价不下数十金，胜地名园目为佳致，而出江南者，复称之曰南海棠，大抵相类而花差小，色尤深耳。”沈立是北宋人，年长于苏轼。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在四川洪雅为官，由于“春多暇日，地富海棠，幸得为东道主，惜其繁艳为一隅之滞卉，为作《海棠记》，叙其大概”。《海棠记》一卷，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有著录，现在已经散逸。不过在南宋陈思所集《海棠谱》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完整的《海棠记》序言、节文以及沈立自作《海棠诗》一百韵。

牡丹和芍药花期晚，应着谷雨花信，已在暮春时节，这个时期百花大都凋谢，绿叶成荫。芍药之名出于先秦，除药用外，它也是著名的传统观赏花卉。古时男女将别，还有赠芍药的习俗。《诗经·郑风·溱洧》便有“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的诗句。晋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言：“将离相赠

之以芍药者何也？答曰：芍药一名可离，故将别以赠之。”自唐、宋尊崇牡丹以后，芍药在花卉中的地位才稍有降低。宋代以扬州芍药最为闻名，王观《扬州芍药谱》记载了当时名品39种。

和梅的高洁、兰的清幽、菊的恬淡不同，牡丹雍容华贵的仪态最投合大众的心意，因此喜爱它的人最多，为之作花谱的人也最多。熙宁五年（1072）农历三月，苏轼与时为杭州知州的沈立在吉祥寺寺僧守璘的园圃中赏牡丹，当时“圃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数。酒酣乐作，州人大集，金盘彩篮以献于坐者，五十有三人。饮酒乐甚，素不饮者皆醉。自舆台皂隶插花以从，观者数万人”（苏轼《牡丹记叙》）。第二天，沈立向众人出示所作《牡丹记》十卷，并请苏轼为序。从苏轼《牡丹记叙》中我们可以知道，《牡丹记》的内容“凡牡丹之见于传记与栽培剥治之方，古今咏歌诗赋，下至怪奇小说皆在”。虽然沈立十卷本《牡丹记》现在已经完全看不到了，但是其他流传至今的多种宋人牡丹谱录依然为我们展示了宋代牡丹的培植盛况和花开时的倾国之姿。

二

牡丹又称鼠姑、鹿韭、白茸、木芍药、百两金，最早并不是作为观赏植物进入人们的视野。唐以前，有关牡丹的记载几乎都与它的药用价值相关，《计然万物录》载“牡丹出汉中河内，赤色者亦善”；孙思邈《千金翼方》载牡丹“生巴郡山谷及

汉中，二月、八月采根阴干”，所说的都是药用牡丹。药用牡丹品种少，花比较小，花瓣也只有五到七片，且多为野生。人工培育观赏类牡丹大约在隋以前便已经开始，但一直没有形成规模。唐代李绰《尚书故实》载：“世谓牡丹近有，盖以国朝文士集中无牡丹诗。张公尝言北齐杨子华画牡丹极分明，则知北齐已有牡丹矣。”张公的身份历来颇有争议，《故实》中言“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博物自同于壮武，多闻远迈于聿臣”，现代有学者论证其为唐代画家张彦远。由于张氏深知于画，他所说北齐杨子华牡丹画应当不是信口之言。宋人笔记小说《青琐高议》中题《隋炀帝海山记》中又有炀帝在洛阳建西苑，从易州运牡丹二十箱的记载。虽然这些都是在牡丹极盛的唐、宋时期才有的记录，不能称为信史，但是我们由此可以知道观赏型牡丹的培植在那时已有所起步了。

直到唐代，由于受到武则天的钟爱，牡丹才被大量的培育起来，不但品种、花色增多，且出现了双头牡丹、千叶牡丹等观赏性极高的新品。自此以后牡丹广为世人爱赏，文人吟咏，相继不绝。刘禹锡《赏牡丹》诗言“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从中便可以看出牡丹在时人心目中地位之高。牡丹品种的增多与当时身怀植花绝艺的“花师”也有着很大的关系。柳宗元《龙城录》“宋单父种牡丹”载洛阳人宋单父：

字仲孺。善吟诗，亦能种艺术。凡牡丹变易千种，

红白斗色，人亦不能知其术。上皇召至骊山，植花万本，色样各不同，赐金千余两，内人皆呼为花师。亦幻世之绝艺也。

唐代牡丹以长安和洛阳最盛，而在北宋，则以洛阳花独冠天下。除当地物候适宜外，培植技术的先进也是洛阳牡丹甲天下的原因之一。关于洛阳牡丹有一段传说，据宋高承《事物纪原》记载：“武后诏游后苑，百花俱开，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洛阳之花冠天下。”这虽然只是小说家言，但从中已经可以看出洛花之擅美，以及世人钟爱牡丹已经不仅仅因为它的姿色，还有它被寄予的独特精神。

洛阳牡丹的品种变迁和培植方法可以在欧阳修《洛阳牡丹记》和周师厚《洛阳花木记》中看到翔实的记载。天圣九年(1031)，欧阳修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其后四年，虽然每年春天都因故“未尝见其极盛时，然目之所瞩，已不胜其丽焉”，后来写下《洛阳牡丹记》。欧记分“花品叙”、“花释名”、“风俗记”三部分，“花品叙”共列出当时著名的牡丹品种二十四品，并在“花释名”一节中对各品种特征做了详细说明，“风俗记”中则记载了洛阳赏花、贡花、种花之俗。由于新品频出，旧品的欣赏者逐渐减少，花户可以盈利的空间也随之减少，因此往往很快便受到冷落。欧阳修言：“初，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苏家红、贺家红、林家红之类，皆单叶花，当时

为第一。自多叶、千叶花出后，此花黜矣，今人不复种也。”姚黄、牛黄、魏花、左花等都是牡丹品名，关于它们的命名，欧阳修也在“花释名”中做了该要的总结和举例说明：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异者而志之。姚黄、牛黄、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红，以州著。细叶、粗叶寿安，潜溪绯，以地著。一搦红、鹤翎红、朱砂红、玉板白、多叶紫、甘草黄，以色著。献来红、添色红、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晕檀心、莲花萼、一百五、叶底紫，皆志其异者。

周师厚稍晚于欧阳修，他所写《洛阳花木记》中牡丹的品种更多，共 109 种，又单做《叙牡丹》一节，从品种特征、来源上细论了 45 种牡丹。这一节在宋以后被单行刻印，称《洛阳牡丹记》。另外，《洛阳花木记》还记载了其他花卉的品种，如芍药四十一品、杂花八十二品，以及果子花、刺花、草花、水花、蔓花各品。除此之外，《花木记》中详细载有四时变接法、载花法、打剥花法、分芍药法等当时的园艺技术，即使到现代，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洛阳以外，其他各地也多培植牡丹，如陈州、越州、彭州等地。当时洛阳培育的新品种也会被带往各地，在四川彭州，当地的花被称为“川花”，从洛阳传来的品种称为“洛花”。宋